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 “内在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郝 戈

摘 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辩证地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到底是要把握住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内在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特别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之中。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其实质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趋势。批判与超越的内在性质,决定了社会批判中始终蕴含着社会建构的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对于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外在化”局限的当代矫正、重建工具理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内在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逻辑 批判理论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16.06.003

马克思所关注的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运行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是行进于自身矛盾裂变之中的辩证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始终贯穿着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就是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相应地,现代性治疗的关键就是依据这些矛盾的演化趋势来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由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必然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本文拟对这一“内在批判”的理论内涵及其当代意义作专门探讨。

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与现代性具有本质性的深层关联。辩证法是同时贯穿在现代性的现实与观念之中的普遍规律。现代性在其根基处遵循着辩证法,

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内在地包含着多元矛盾的综合体;其次,这一总体在内在矛盾的推动下,持续进行着由生成、发展再到革新的历史运动。现代性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裂变、不断发展演化的辩证历史过程。

既然现代性本身就是辩证的矛盾综合体,那么对待现代性就应当采取辩证的态度。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马克思坚持辩证矛盾的辩证批判,寻求辩证矛盾的辩证扬弃。诚如伊格尔顿所说:“现代激进思想往往在整体上分为怀旧—倒退的和进步—技术的两种倾向……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离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①浪漫

^①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主义等反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展开了十分激进的批判,认为现代化进程瓦解了既定的文化传统、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造成了社会动荡、价值颠覆与生态危机等日益深化的困境,因而,整个现代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史。与此迥然对立的是现代主义,则把“科技”和“进步”奉若神明,坚持人类社会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现象,并论证了进步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且必将通过持续的进步而得以完满解决,现代文明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马克思扬弃和超越了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抽象对立,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新的综合。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和深化了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进步的必然性、社会的合理化以及人性的不断完善等观点,对现代性采取了肯定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继承和发展了反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弊病和困境的诸多批判,对现代性采取了否定态度。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基础上,马克思达到了“否定之否定”的综合即辩证的现代性态度。其中,现代主义的“正题”与反现代主义的“反题”分别被当作具有片面合理性的个别环节而融会在一个更高的矛盾统一体中。马克思的这种辩证态度的关键就在于: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谈论现代性的合理与不合理,而是深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之中去把握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理性与异化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真正揭示出现代性的辩证规律。

以辩证法来把握现代性,就要求从历史性和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现代性,从而生发出针对现代性的批判视野。辩证法的这种批判性质首先根植于黑格尔所说的“否定原则”：“对于这否定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①。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却达成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论证了时代精神对德国现状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确证了“历史的终结”。马克思却试图重新开启这一自我封闭的否定原则,将其提升为真正改造现存世界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他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

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对现存事物两重性的矛盾分析,奠定了肯定中包含着否定的批判立场。现代性之所以是流变的过程,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正是因为其内部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而,现代性的流变性正是根源于它的矛盾本性。

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尤其需要辩证地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路径就是把握内在于社会之中的——尤其是经济基础之中的——矛盾,剖析其对抗和分裂性质:“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③。现代性生成、发展和终结的根源、动力正在于其内部蕴含的各种矛盾;多种内在矛盾从根基处推动着现代性的发展流变,塑造着现代性的结构和性质,规定着现代性的趋势与方向。因而,要审视和理解现代性的辩证本性,最关键的工作就是要牢牢抓住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只有真正理解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明确其结构特性和运动规律,才能从矛盾发展的视野中把握现代社会的运动和方向。更进一步地说,只有抓住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才能具有“内在性”。

辩证地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到底是要把握住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马克思所研究的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发展的现代性,因而从根本上受制于资本的统治,遵循资本的逻辑。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即价值增殖规律,其核心内涵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二重性矛盾。一方面,劳动过程是使用价值生产过程,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人类文明创造的基础。另一方面,价值增殖过程则是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对抗分裂的基础。资本逻辑的二重性深藏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并使得现代性的内在批判与内在超越成为可能。

二、内在批判与内在超越

伊格尔顿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对于现代性来说,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马克思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内在批判者”：“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论证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做出轻易的界定”^①。那么，什么叫“内在的”批判呢？它和外在的批判有什么不同？简言之，如果一种针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把握之上的，这种批判的根据与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过程，那么这种批判和超越就是“内在的”。

“内在批判”是相对于“外在批判”而言的。所谓外在批判就是指，批判的根据外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施蒂纳、蒲鲁东等思想家对社会进行诊断治疗的立足点都是“固定观念”和“抽象范畴”，这些观念和范畴是通过非历史主义的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思辨而获得。持有这种观念和范畴的批判者恰恰不懂得观念范畴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暂时产物，却错误地认为它们超越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过程，甚至认为它们能够支配社会历史过程本身。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②依据于“超历史”的抽象观念和形而上学范畴等这些从外部引进的、外在于历史的根据来批判现代性并提出相应的出路，这正是外在批判的根本特征。以蒲鲁东为例，马克思指出，在此种外在批判的视野中，“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③。这种“矛盾”仅仅是一种不合理抽象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外部对立，根本无法触及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外在批判的例子在西方思想史上非常常见，黑格尔之后欧陆思想发展的主流趋势都表现出显著的外在性特征。为了批判社会现实，青年黑格尔派一路的理性主义者诉诸自我意识、人性和自我等抽象概念，而尼采与海德格尔一路的非理性主义者则诉诸古典体验、酒神精神、强力意志、生命本真和诗意美感等思辨范畴。可以说，外在批判的病根就在于它依据于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将一系列固定观念和抽象范畴看作可以超越历史、超越社会的普遍价值、永恒标准，并以此来作为批判现代性的根据与基点。

与外在批判迥然不同，内在批判的核心就在于：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特别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之中。现代性自我扬弃的趋势构成了内在批判得以可能的现实前提；与此相应，只有从内在批判的视野出发，才能够把握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趋势。首先，批判的根据与立足点，扎根在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中，内在于现代性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任何一种社会批判，都需要立足于一定的评价标准、评价规范，否则就无法在批判对象中区分出什么是需要批判的，什么是需要褒扬的。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是内在的、历史的，其理论前提是要在现存的社会条件本身中为其批判的观点寻找根据。因为实际的社会都并非和谐的统一体，它们自身中包含着矛盾的方面和各种矛盾力量。它们有的支持已建立起来的秩序，而有的则与其对抗。社会现实是矛盾的统一体。否定的和批判的力量就内在于其中，它们无须在超越价值的形式中从外部引进”^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没有预设一种“外在于”、“先在于”或“超越于”实际历史过程的先验理想标准，而是扎根于历史发展的趋势、方向和目标。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即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生产力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本身就孕育着现代性的“解放潜能”与“异化形式”。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正是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尤其是现代历史中所发现的客观趋势和演化方向。因而，他正是处处从这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演化方向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本身的。这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放潜能”。辩证地、历史地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就是要区分现代性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即资本逻辑蕴含的压迫性生产关系与解放性生产力、社会分裂对抗与物质文明创造。批判的基础和立足点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解放潜能。“内在批判”的实质就是以内涵于现代性的解放潜能来批判现代性的异化形式，

①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1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④ 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以内生于现代性的客观进步趋势来批判现代性的倒退趋势,以内在于现代性的合理要素批判现代性的不合理要素。

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最终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现代性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其实质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趋势。至今为止的现代性过程已经积聚了大量难以克服的矛盾以及为这些矛盾的解决做好准备的条件即解放潜能和发展趋势。对既有现代性发展形式的超越,首先就必须立足于现代性自身提供的这些现实条件,走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超越的基础并不是通过理论思辨从社会历史现实外部引入的,而是从现代性内部孕育出来的。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超越,其本质在于超越某种畸形、残缺、片面化发展的现代性,而走向另外一种健康、完整、全面发展的“新现代性”。具体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即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在再生产和积累中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的社会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从自我扩张走向自我克服,且扬弃其异化形式,并释放出解放潜能。由此,资本主义现代性才能实现内在超越,走向社会主义新现代性。

与马克思不同,许多现代思想家都没有在现代性的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致使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丧失了内在性,扩大化为针对既有文明形式的终极揭露、全盘否定和彻底拒绝。哈贝马斯指出,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又译阿多尔诺、阿道尔诺)等的现代性批判缺乏内在依据,批判本身就会变成全盘性(包括对批判自身的前提)的大拒绝,就会走向无所依托、自我攻击的悖论:“批判攻击到了其自身的有效性前提”。“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尼采一样身陷尴尬: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揭露的终极性,仍想继续进行批判,他们就必须保留一种标准,用来解释一切理性标准的堕落。面对这一悖论,批判在自我兜圈子过程中迷失了方向”^①。与许多现代思想家否认现代性的积极潜能,试图从外部寻找出路的“大拒绝”相比,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并不依靠外部强加的“真理”或超历史的抽象原则——在现代性自身中就已经内在潜藏、孕育着为它自己挖掘坟墓和预备复活的“历

史真理”。

三、社会批判引导社会建构

批判与超越的这种内在性质,决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思想中始终蕴涵着社会建构的指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正是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这双重维度的统一。

马克思并没有走向对现代性全盘拒绝、彻底抛弃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走向了“新现代性”的积极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许多思想家以拒斥“启蒙承诺”、“乌托邦幻想”、“意识形态话语”和“宏大叙事”为由在不同程度上丢弃了“社会建构”的意向而径直奔向纯之又纯的“社会批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全盘拒绝和彻底颠覆的倾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批判理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例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的结尾处做了如下的宣称:“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依然是否定的。它要仍然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②。这种过激做法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忽视了马克思的批判和超越的内在性质,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之间所做的合理区分,因而也就忽视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内在蕴涵的社会建构潜能。

如果说要在当代境遇中“回到马克思”,那么就回到马克思的这种社会批判视野中的社会建构指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要旨就在于“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就在于“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③。这一思想在社会批判中蕴涵着社会建构,二者相互贯通,彼此依存,恰恰是要自觉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起桥梁。

具体来看,社会批判构成了社会建构的基本视野,社会建构理论在社会批判的视域中得以具体阐明。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可以粗略地划分为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②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4页。

两个层面,即针对现代性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针对现代性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两个层次的批判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正是意识形态批判开启了超越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视域。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了超越资本主义、建构新现代性的前提、基础和路径。对现代性社会存在的批判,就是要发现深藏于现代性之中的内在矛盾,把握这种矛盾的发展趋势,从中寻找“新社会”的萌芽和潜能。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发现的这些解放潜能,就构成了建构新现代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批判分析,没有对现代性的“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的这种批判的区分,建构未来社会的思想和行动就变得缺乏根据,成了彻头彻尾的乌托邦空想。

当然,社会建构理论也不是消极地跟随批判理论的否定性逻辑的,它还积极地确立了批判本身的导向目标;在实际的理论思考进程中,社会批判的进程服从于社会建构的要求而得以深化与提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并不是“去价值化”的虚无主义,也不是缺乏肯定目标的否定冲动,而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朝着一定的方向而展开的。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总是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资本主义的诸种矛盾和趋向,并根据它们促进或阻碍发展的程度来判定对它们应当进行批判还是应当褒扬。这样一来,社会批判的运作,就内在地依赖着人和社会发展这一内在取向、内在目的。因而也就可以说,社会批判始终是为了人的发展而开展的,始终是为了社会建构的目标而进行的。脱离了社会建构的内在定向,社会批判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有了正确合理的社会建构方向作为指导,社会批判就会持续深化,健康运行。

说到底,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之间的这种互动循环关系,正是源自理论自身的内在批判、内在超越的特性。马克思是依据内在于资本主义的“解放潜能”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趋势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解放潜能,一方面构成了社会批判的标准,另一方面又构成了社会建构的方向。因而,当马克思依据解放潜能开展现代性批判时,他实际上也就把社会建构的方向当作了社会批判的向导和目标。一方面,社会批判固然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未来趋势,从而开启了社会建构的基本视域;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社会批判所依据的标准正是社会建构的方向,因而建构其实正是走在批判的前面引领着批判的持续开展。

四、内在批判的当代价值

新的时代条件激活了经典理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 21 世纪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接近马克思《资本论》中合理抽象出的“纯粹资本主义”概念,思想具体对现实具体的再现力量得以凸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在当代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无可替代的理论锋芒。特别是对于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局限性的当代矫正,进而推进资本主义制度矛盾性的当代诊断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们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经历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工具理性批判的转向,日益丧失内在批判的维度,从而导致了批判的“外在化”和“乌托邦化”的困境。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法兰克福学派奠基者霍克海默起初在确定“批判理论”基本纲领时,将批判理论锚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的三个哲学环节:经济学范畴的内在批判、拜物教批判和制度的矛盾分析与危机诊断。然而,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新形势,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权力的控制系统已经改变,甚至取代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原先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日益变得“政治化”了,并且受制于官僚政治的要求。因而,他们开始改变批判理论的范式:消解了对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历史必然性的信仰,淡化了批判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基作用。终于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批判理论以《启蒙辩证法》为标志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的新范式^①。这种批判理论主张,现代性的主导逻辑正是社会生活全盘的“社会合理化”甚至“工具理性化”,具体表现为资本统治、官僚政治和科技主义统摄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各个层面。这一理论范式的特征集中体现

^① 齐泽克、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1~96 页。

在,其核心范畴“工具理性”综合融会了经典理性主义的“理性”、“理性化”概念、非理性主义的“权力”、“技术”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资本统治”、“异化”和“拜物教”概念。基于此,工具理性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原则,被用来指涉社会的组织原则、文化的意义结构以及人格的价值取向。这样一来,“工具理性”范畴就被极大地泛化和模糊化了,失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的具体界定,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赋予的社会历史内涵,进而导致了工具理性批判自身的根本困境:由于整个社会都被理解为全盘工具理性化的,那么理论就无法在社会生活内部找到一个确定的根据、立足点来作为“非工具化的理性”,并基于此展开对工具理性化的批判。由此,工具理性批判家们不约而同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去寻求批判根据,例如霍克海默晚期的宗教转向,阿多诺的“非同一性”以及马尔库塞的作为“补偿性记忆”的“爱欲”等等,逐渐蜕变为一种“带有乌托邦意图的怀旧的历史哲学”^①,最终落入尼采之后“泛浪漫主义”反现代性的思想窠臼之中。批判理论的这种衰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批判理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社会制度诊断的疏离,导致批判之内在根据的丧失,引发批判的“外在化”。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们对批判理论的“外在化”倾向进行了深刻反思,力求开辟“内在批判”的新路径,然而却遭遇严重困难。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外在化”、“总体化”局限以及“自我攻击”困境进行了深入反思,将其病根归结为批判理论没有解决好自身的“规范基础”问题。对此,哈贝马斯重新阐释了韦伯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提出了“文化现代性”与“社会合理化”的异质性来作为其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并进一步借助语用学分析,将价值理性、文化现代性概念具体化为交往理性、交往行为概念来作为其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基于此,哈贝马斯就按照现代的领域分化逻辑对整个社会做了“三分法”的界分: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系统服从于工具理性、策略理性的原则,而以语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则服从价值理性、交往理性的原则。进而,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矛盾的根源更为明确地界定为社会系统的内在结构性冲突:“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工具理性行为领

域)入侵、占据了生活世界(交往理性行为领域),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进行了僭越与压抑。具体来说,社会现代化偏离了文化现代性的整全内涵而获得了片面发展,经济和政治系统畸形膨胀,从而使系统逾越自身的合理性界域,入侵、渗透和控制了生活世界的运作,“生活世界由于被规训、被控制、被分割和被操纵而出现变形”^②,生活世界原有的交往理性被遮蔽、抑止和消解,最终不得不服从于系统的工具合理性的支配,由此导致整个现代生活发生扭曲和异化。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矛盾的根源归结为系统与生活世界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外部对立关系以及社会现代化对文化现代性的偏离。由此,他提出如下的现代性治疗方案:重新激活文化现代性概念及交往理性原则以矫正片面的社会现代化,通过对话协商对社会诸领域间关系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以此来消解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犯和支配,恢复领域分化的合理界限,进而克服现代性的矛盾。哈贝马斯明确地把批判理论的根据、立足点理解为一种内在于社会结构的“规范基础”即内在于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可以说,哈贝马斯使得已经“外在化”的批判理论重新恢复为“内在批判”。然而,交往理性这一规范基础究竟从何而来呢?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追问就会发现,哈贝马斯将规范基础立足于交往行为的语用学结构及其“普遍有效性要求”,其实正是一种超历史的抽象。虽然他一再强调,这种语用学结构的“有效性要求”是二重性的,它既具有经验的现实性,受制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定,同时又具有先验的理想性,超越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具有普遍性;甚至称之为现实的交往共同体与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交织^③。但这里仍然存在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康德式“二元论”的先验主义局限:因为,哈贝马斯恰恰无法说明语言的经验性内容与其先验性规范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先验性规范如何可以适用于特定经验内容而普遍有效;另一方面,特定经验内容何以可能产生出一种普遍的先验性规范。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外在化蜕变及其恢复内在批判的困境,促使我们重新阐发马克思对资本

① 齐泽克、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第98、109~115页。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399页。

③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374~375页。

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的当代价值。要言之,这种当代价值集中体现在,能够用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思想来矫正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外在化”发展方向,进而推进对资本主义的当代诊断。

首先,要重建工具理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在资本逻辑批判视野中将“外在化”的社会批判重新“内在化”。这里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是何种关系。即使是霍克海默、阿多诺自己也曾承认工具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的基础是资本统治:“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这一切,并不是技术运动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①。正是以资本这一最为强大的经济权力作为基础,技术理性以及其他各种工具理性形式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取得宰制性的地位。可见,促使批判理论转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并不是(像批判理论家理解的那样)以国家官僚政治的逻辑取代了资本逻辑,而是将国家权力和国家垄断直接或间接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使之服务于资本增殖和缓解社会基本矛盾的需要,由此产生出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资本私人性的国家资本主义新形式。进而言之,即使我们承认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社会的领域分化使得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各自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领域即系统或生活世界之中,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资本权力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在政治经济系统和生活世界之中的广泛贯穿与统摄作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关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应该解读为,现代社会领域分化只是社会现实的表象,而资本统治的总体性才是社会现实的决定性本质。由此可见,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在于生活世界与系统、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而治之”,而是在于资本统治的辩证扬弃与总体超越。事实上,当代西方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资本逻辑批判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根基性作用。例如,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马克思阅读”这一德国学术流派就力图重建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其次,重建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将批判的价值前提建基于资本逻辑所孕育

的历史客观趋势之上。这里涉及的主要难题是能否克服批判理论的价值前提或规范基础所面临的先验与经验、规范与行为、价值与事实以及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其实,早在马克思大学时代《给父亲的信》中就已经表明了其克服康德式的先验主义二元论的致思路向:克服“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外在对立,跟随黑格尔探求事物自身的理性必然性。及至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断深化,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建立在历史科学的牢固根基之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所依据的规范基础虽然也是一种价值前提,但它不是某种先验的价值理想悬设,而是内生于现代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发展趋势的理论表达。具体来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进程的理性自觉,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逻辑内含的发展趋势、解放潜能的历史性理解。对这一价值前提进行理论把握,需要经历一系列历史认识过程,简言之,首先从“现实”或“历史必然性”中把握“潜能”或“历史可能性”,而后再从“潜能”或“历史可能性”中合理抽象出“价值应当性”^②。这种价值前提内在于作为批判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保证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内在性与现实性。

综上观之,只有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才能重启和发展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批判维度。这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发挥其当代价值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推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新趋势的深入研究。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2XNJ01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郗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河

^①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② 参见郗戈《规范基础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